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Research on Scholars' Making a Living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徐永斌 著

中華書局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Research on Scholars' Making a Living i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徐永斌 著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徐永斌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9.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3690-6

I.明… II.徐… III.知识分子-研究-华东地区-明清时代
IV.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5196 号

-
- | | |
|-------|---|
| 书 名 | 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
| 著 者 | 徐永斌 |
| 丛 书 名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 责任编辑 | 吴爱兰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690-6 |
| 定 价 | 88.00 元 |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一

范金民

中国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孔子就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孔圣人认为，如果为了治生求富，无论什么营生都是可以考虑的。时代的步伐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日益完备、高度成熟，文人中第的比率日益降低，入仕的竞争日趋激烈，读书从政之外，寻求谋生之方显得愈益紧迫，极为必要。

明中期嘉定人沈龄称当时“文士无不重财者”，江阴人李诩记时人重财数例：曾有人向名士常熟人桑悦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桑悦说：“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錠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苏州书画家唐寅，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簿，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苏州文人都穆雅有“不苟取”之名，曾患疾，当有人求字时，以帕裹头而强起，旁人请其休息，都穆说：“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曾为人向祝允明求字，问其“是见精神否”（当时人以取人钱为“见精神”——范按），祝回答“然”，并补充道：“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马又问何物，答称“青羊绒罢”（[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1“文士润笔”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16页）。大名鼎鼎的苏州才子唐寅会试落第后，以书画为生，赋诗描摹其生涯：“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兴来只写江山卖，免受人间作业钱。”（[明]唐寅：《唐伯虎全集》补辑卷4《题画一百十三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更吟诗自嘲：“抱膝腾腾一卷书，衣无重褚食无鱼。旁人写我谋生拙，拙在谋生乐有余。”（[明]唐寅：《唐伯虎全集》卷3《风雨浹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这些当时声名赫赫、后世景仰的江南文人，以书画易换衣食，获取润笔毫不含糊，活脱脱是文人治生的形象写照。到了嘉靖、万历之际，著名文人、官至兵部侍郎的徽商子弟汪道昆更曾借徽商之口说：“丈夫不为名高，则为厚利，安能郁郁坐困乎？”（[明]汪道昆：《太函集》卷28《沈文桢传》）清康熙十七年

(1678),连后来成为著名理学家的陆陇其也认识到:“农工商贾是其本业,不可谓之俗物。”他读著名的古文大家苏州人汪琬的《钝翁类稿》有关“今之君子,仰无以养其亲,俯无以畜其妻子,饥寒之患,迫于肌肤,此其时与古异矣。当不得志,其能遁世长往,浩然于寂寞之滨哉?吾以是知其难也”一段时,大发感慨谓:“不觉为之慨然,不得不令人思许鲁斋‘治生为急’一语。”([清]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5戊午中,中华书局,2016年,第136—137页)更有甚者,清初思想家唐甄(1630—1704),曾在苏州做牙人以谋生,有如此精彩问答:人问:“学诗书,明《春秋》,合乎古人之义,人皆称为君子,可谓贤矣,而何乃自污于市?”唐答:“今者贾客满堂,酒脯在厨,日得微利以活家人,妻奴相保,居于市廛,日食不匮,此救死之术也,子不我贺,而乃以诮我乎?”人问:“民之为道,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而牙人尤下,先生为之,无奈近于利乎?”唐答:“吕尚卖饭于孟津,唐甄为牙于吴市,其义也一。”(唐甄:《潜书》上篇下《食难》,中华书局,1955年,第86—88页)唐甄与他人的问答,形象地说明,随着人生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治生求利有了理论依据,文人对自己的治生生涯自视甚高,辩护起来显得底气十足。明清文人,治生为急,数百年间,前后一脉相承,赓续不断。

对于这种极为平常极为普遍的明清时代文人治生现象,在学界已经引起注意,在不同层面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也有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但既有研究远没有揭示出明清文人治生的丰富而生动的繁复面貌,对文人治生极为突出的江南地区还殊少细腻的描述和精到的考察。明清江南文士是极为突出的著名地域文人集团,其生活状态富有学术意义和现实参考意义。徐君永斌,以其明清史学和文学的知识积蓄,最近十余年肆力于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研究,搜集和征引了方志、文集、笔记等丰富材料,专门探讨江南文士群体的治生状况,撰成《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为明清人文研究和江南社会生活史研究,奉献出了一部颇有新意、较有力度的心血之作。

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主要考察分析文士的治生群体、治生途径、治生用途及其治生原因,以江南为地域范围,综合考察明清文士的治生活动和特点,并以代表性事例和人物加以说明和验证,更在相应篇章中附以处于不同时代从事不同治生行业的代表性个案,比较不同时代江南文士治生的共性与差异及其原因;下篇探讨作者所定江南范围南京、扬州、苏州、杭州、

上海、徽州六大区域内的文士治生特点,考察文人治生的行业诸如处馆、游幕、书院、书画、刻书业、业农、经商等,并分析其侧重点。作者还在余论部分对文士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展开论述,以进一步论述文人治生与文学流播的关系。全书既分区域考察各地文人的治生情形及其异同,又分类型探讨江南文人治生的途径,更分析文人治生的用途和原因,既有总的论述,又择取各类代表作典型分析,清晰地揭示了明清江南文士的治生情形,较为形象地呈现出明清时期江南文人治生的风貌,从而较大程度地丰富和推进了明清生活史和江南人文史的研究。

永斌君为人朴实,凡事认真。承他厚意,感念师生之谊,每有新作,往往让我先睹为快。他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前,曾将书稿交予我并请提修改建议。当时我觉得文如其人,《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行文较为平实,较少跌宕起伏,但提供了不少生动事例,做了不少学理分析。若能博采事例,分类深入探讨,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深耕挖掘,在已有框架下完善提高,相信一定能够达致更高境界,做出新的学术贡献。

于金陵草场门外寓所

2017年2月14日

序 二

萧相恺

我和永斌是同事。说是同事，其实共事时间很短——他到所里时，我已经退休了。但他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导师徐朔方步奎先生，却是我十分敬重，且有过交往、至今难忘的权威学者。

读步奎先生的大作，总觉得他与人论争，芒角犀利，讲理论道，英气逼人，想象中，他一定是位十分严厉、难于接近的人。1990年，在第一次“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那时，我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名普通编辑，负责会务接待等事宜。因为有上面所说的“想象”，见面时，颇觉惴惴。但不久，我就发现，大会发言，徐先生确实如我想象的那样，严肃严谨，在一些成名学者面前，他亦不苟言笑，但对我这个无名小辈，却很“客气”，说读过我和欧阳健的《水浒新议》，“名实相副”，确实“新”；说我们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很有价值，勉励我继续努力，俨然一位邻家老翁，和蔼可亲。徐先生的汤显祖研究，成就之巨，中外闻名，而汤显祖是我们江西临川人，无形中，似也拉近了我们的情感距离。这是不是佛家的所谓“缘”？

那次会后，我曾多次书信请益，徐先生都谆谆教诲，还把他的名著《小说考信编》赠我，附信中有“对于《水浒传》的作者，我与你们江苏的一些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欢迎批评”的话。又记得他给我寄过一篇研究宋懋澄的稿子，亦附有一信，说：“如果不合贵刊的要求，掷还就是，千万不要勉强。”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

听传言，徐先生对学生很严厉，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对自己的学生却似乎爱护有加，常流露出一种“舐犊之情”。记得他曾寄过一篇廖可斌的稿子给我，稿子中附有一信，信中讲了他推荐这篇稿子的理由。坚持学术原则的同时，就很有些护犊的意味。

徐先生仙逝时，他的学生把讣告发给我。悲痛之余，我代表《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古代小说研究网”，写了两句挽词，寄给治丧委员会以示哀

悼：“徐步奎先生千古——学界巨星陨 风范人间留”。因为悲痛，不问平仄对仗，只抒内心而已。

还记得永斌到文学所之时，知道他是徐先生的博士，“严师高徒”，我内心真是喜悦无限，期待无限。

对于永斌的研究，在他到文学所之前，我了解不多。直到院里决定，要选择一批新近进院博士的博士论文，出一套博士论文丛书，要我参加评选时，我才认真地拜读他的研究成果。永斌送选的著作是《凌濛初考证》。这是一部实证性研究著作，资料搜罗完备，论证合理充分，颇能服人，与乃师的研究路子相类。

如今步奎先生仙逝十周年了，他的弟子永斌又把《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的大著寄给我，嘱我写序。这是永斌对我的信任，竟不由得又想起步奎先生来。

读完永斌的论著，第一印象仍然是：永斌继承乃师步奎先生的传统，在做着实证性的研究——一种从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研究历史与研究现状开始，广泛搜罗资料，产生并论证自己观点的研究。这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潜入、浮躁不得、功利不得的艰难研究。看得出永斌对自己职业的执着。而读者要读这部著作，我则建议先从论著的《后记》读起。《后记》中，永斌叙述了写作这部论著的因缘。研究者写作论文，触发于自己经历的情况并不少见。而永斌的叙述，更令我感动。永斌的感恩态度也令我更了解他的为人。读过这篇《后记》，我也更能体会《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一书论述文人治生与文人生存、文人创作、文化传播之间的紧密关联，更能理解这论题对拓展明清文学、文化史研究视野的价值。

我们常说，穷愁著书。论杜甫，总会提及他的贫穷生活；谈曹雪芹作《红楼梦》，常常用“举家食粥酒常赊”说明其著《红楼梦》的原因。这固然不错，但杜甫毕竟还有所茅屋可居，曹雪芹毕竟还有粥可食，有酒可赊；若一个人真到了生活不下去的时候，还能著书么？特别是还能著很多有价值的书么？若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治生”而有吃有穿，坚持著述，还能做文学传播的工作，岂不也是一件好事？凌濛初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治生”，成就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多达五十余种编著。李渔不正是靠着组班巡演、芥子园印书，成就着自己的《连城璧》《十二楼》《闲情偶寄》等小说戏曲创作和理论论著？甚至唐伯虎绘画的名声、成就，也与他的卖画

相关。尽管凌濛初、李渔的作品难与杜甫、曹雪芹相比。

在论著中,永斌将面上的论证与个案的研究结合进行,这样的点面结合,既避免了仅有面上研究,容易流于浮泛的毛病,又避免了只研究个案,容易出现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问题。

对个案的选择,永斌也十分用心,选择得颇为精准。比如他选了唐寅、凌濛初、李渔、张履祥四人,四人是四种典型:唐寅是书画家治生的代表,凌濛初是以刻书业为生计的代表,李渔是出版兼组班演戏的典型,张履祥则是多种途径治生的代表。由唐寅以书画治生,论证这种治生手段对书画创作及书画市场繁荣的影响;由凌濛初的刻书和“二拍”的创作,论证文人治生对小说创作及其传播的影响,这已如上述;而由李渔的刻书并组班演出,则论证了文人治生对推进小说和戏剧创作并传播的作用;由张履祥的治生,又论证了“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再比如,他选了《儒林外史》作为个案进行分析,指出《儒林外史》中对虞博士处馆、牛玉圃卖文、马二先生以及匡超人选文等等文人治生生活的描写、治生文士形象的塑造,证明文人治生已经是当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等等,都达到了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再结合其他面上的分析研究,永斌有关“文士治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作品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的大量诞生,二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一方面,文士通过治生获得了薪酬,改善了明清文士的生活环境,为以后的明清戏曲小说创作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通过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市场的反馈,又对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切近读者和市场的文学编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戏曲小说题材和艺术性的变化。文士治生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通过文士和书商的合作,文士使其文学作品得到销售渠道和传播渠道,促进了出版业的发展,特别是明清戏曲小说不断得到社会的认知和认可,扩大了戏曲小说作品的接受度;另一方面,随着明清戏曲小说的不断传播,书商得到的利润不断扩大,文士的薪酬也不断增加,促进了文士的创作动机”,丰富了文学作品创作题材的结论,便有了很强的说服力。

论著的标题是《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其研究的背景,主要放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对此,我又不能不说,论者眼光犀利,着眼点正确。宋代通俗文学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商品经济发展,这使得某些文学具有了商品的色彩,尤其是通俗文学,比如通俗小说与戏曲。到了明代,随着整

个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里，士农工商，商虽然仍居末位，地位却有相当程度的提高，至少是鄙视的程度有很大的减轻。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的“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观念的产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而文学的商品色彩，相较于宋，此时亦更见浓重。这种社会现实，无疑为文人的治生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扩展了他们的谋生范围；又正是这种环境，加重了明清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浓重的商品色彩。于是这种研究，也就有了必要与可能。

如上所述，永斌的着眼点主要在明清江南文士的身上，但论著所涉，实不止于明清这个时代的人文，也不止于江南这个地域。比如，书中曾对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文人的治生状况作了不少的分析阐述，像穆修于京都相国寺设肆鬻书、崔唐臣科举落第后从事经商、书会才人创作话本等等。这些论述，似乎与论题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因为，从中我们可以见出源流，也看得出这部论著的“史”的厚重。论著论证的文士治生手段也很多，绝不止于我在上面所提到的，比如文士的收受润笔、文士的游食等等。有关这些，读者诸君可以从书中读出，毋庸我再赘言。

拉拉杂杂写了上述这些话，算是我读此书的一些心得，更是一种续缘——与步奎先生结缘的延续。有门生如此，步奎先生在天之灵，当亦感慰藉。借用步奎先生的话：永斌，继续努力吧。

草于海南三亚山营村

目 录

序 一	范金民 1
序 二	萧相恺 4
引 言	1

上篇 文士治生的途径、用途和原因

第一章 文士治生的途径	35
第一节 文士与教育市场	35
一、通过授徒获得束脩	35
二、谋职于书院以获得薪金	40
三、操选政	44
第二节 文士与艺术市场	47
一、文士与书画	47
二、文士与时玩、词曲、弈棋、园林修筑	65
第三节 文士与作文受谢	71
一、作文受谢的来源	71
二、作文受谢的种类及润笔的主动索求	75
第四节 文士从事刻书业	77
一、刻书中心的转移	78
二、书坊的蔚然	79
三、刻印内容及缘起	81
第五节 文士游食	95
一、文士游馆	95
二、文士游幕	97
第六节 文士与医卜、农事及杂作	102
一、行医问卜	103
二、从事农作和杂业	107

第七节 文士经商	112
第八节 两种或多种治生手段交互运用	117
第二章 文士的治生用途	141
第一节 家庭生计所需	141
第二节 交游所需	142
第三节 收藏、筑园或奢侈用度等所需	144
第四节 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所需	146
第三章 文士的治生原因	149
第一节 家庭原因	149
第二节 自身原因	154
第三节 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	159
第四节 时局的影响	166
第五节 官员从事治生的原因	170
小 结	177

下篇 文士治生的重要地域

第四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南京的治生状况	183
第一节 坐馆以治生	183
第二节 书院治生	185
第三节 以游幕、业农、经商或其他杂业为生	186
第五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扬州的治生状况	191
第一节 扬州的区位优势	191
第二节 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治生自养	192
第三节 寄迹或依托于豪门富室	202
第四节 文士经商	208
一、佐人经商	209
二、亲自参与经商	212

第六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苏州的治生状况	218
第一节 以教授生徒为生	219
第二节 书院治生	222
第三节 以卖文为生	224
第四节 出售书画以治生	226
第五节 游幕为生	231
第六节 以刻书或撰稿治生	233
第七节 从事医卜、农耕或其他杂业以治生	234
第八节 文士经商与多种治生手段的交互使用	237
一、文士经商	237
二、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240
第七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杭州的治生状况	244
第一节 授徒以治生	244
第二节 谋职于书院	246
第三节 通过卖文、为人抄书、出售书画作品以治生	249
第四节 通过游幕、医卜、刻书、业农、杂业以治生	251
第五节 文士经商及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254
第八章 晚清时期文士在上海的治生状况	257
第一节 文士治生的时代背景	257
第二节 文士治生的途径	259
一、以授徒为生	259
二、谋职于书院	262
三、出售书画作品	264
四、做报刊专职编辑	265
五、行医为生	266
六、业农	268
第三节 文士经商与多种治生手段的交互运用	269
第九章 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状况	274

第一节 以一技以自养	274
一、设帐授徒,获得束脩	274
二、书院治生	278
三、以卖书画、游幕、医卜、业农或其他杂业为生	280
第二节 文士弃儒经商及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282
一、佐人经商	282
二、独自经商	284
三、多种治生手段交叠运用	293
小 结	297
余 论	299
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34

引言

“治生”一词，语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多为历代采用，言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江南”的概念和区域范围，古今论者众说纷纭，拙著所论及的“江南”限于江浙地区、上海和徽州地区；“文士”的概念虽起源于古时的“士”，但与后者又有所不同，今人论述颇多，恕不赘述。本书所论及的“文士”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文士，还包括曾习儒业后因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者一类。

一、明代之前文士治生概况

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们的食客或贵宾。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亩”；另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有宋一代，朝廷实行崇文政策，优礼文士，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提高文士的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风气，即使是贵为皇帝、王公大臣亦多不免如此。文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尤以北宋为最，如宋太宗曾以感慨的口气对其近臣言：“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①中央的重要职位多由馆阁文士担任：

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993)五月丙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749页。

八九也。……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①

社会上对士人亦是刮目相看，就连富甲一方的商人也以能攀附士人为荣，如朱彧在其《萍洲可谈》卷1“买妾价贵捉婿费多”条中云：“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②诸如此类记载颇多。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宋代文士出于各种原因，汲汲于治生或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既有功成名就的文士，又有落第士子和落魄文士，但以后者为多。

宋代名士包括踏入仕途的文士去从事治生或商业活动，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困难，而主要是出于当时社会上崇尚酬请名士作文或撰写墓志铭的世风的影响，宋代的经济发展及文学艺术商品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名士治生主要是通过为他人撰文或撰写墓志铭来获取报酬，有时具有商品化的特点。这种现象在唐代就已盛行，如南宋时的洪迈曾云：“作文受谢，自晋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③卖碑文及墓志铭者更是大有人在，如韩愈、李邕、王缙均为一时之能手，并获得了巨额酬金，时人讥之曰“谀墓金”^④。宋代文士为他人撰文或撰写碑铭以获酬金的现象更比前代为重，宋人洪迈曾为此感叹道：“本朝此风犹存，唯苏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⑤不过，这种为他人做谀文并收润笔物的现象自元丰以后始趋严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谢肉牒”条云：“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于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于如此，未尝过于丰侈也。”^⑥在宋人的一些笔记小说中也多有记载，如文莹《玉壶清话》卷10中云“韩熙载才名远闻，四方载金帛求为文章碑表，如李邕焉。俸入赏赉，倍于他等”^⑦。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1“孙仲益作墓碑”条云：“孙仲益每为人作墓碑，得润笔甚富，所以家益丰。”

①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8“又论馆阁取士劄子”条，中国书店，1986年，第901页。

② [宋]朱彧：《萍洲可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06—2307页。

③ [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6“文字润笔”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286页。

④ 在《李义山文集》卷4《刘义》中，曾记载李商隐讥笑韩愈为他人撰写碑铭以牟取巨额酬金事：“（刘义）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谀墓金”之名，由此而来。

⑤ [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6“文字润笔”条。

⑥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51页。

⑦ [宋]文莹：《玉壶清话》卷10，《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二），第1530页。